

第一章 緒論

近年來，關注戰前日本帝國對殖民地台灣進行的各種調查，並探討此一現象之歷史意涵，已有數篇先行的研究成果立下典範。其中，吳文星的系列論文詳實究明知識界在日本取台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日治最初十年學術界與台灣經營的關係。歸納其論點可知，1874年日軍侵台事件發生前後，日本積極掌握台情現況，並以之左右決策和教育民眾，不少實踐者成為殖民地經營的先驅。¹國家主義思想家德富蘇峰創辦的民友社則利用影響力，向日本當局大力鼓吹佔領台灣之必要性，更不時批評總督府的施政，呼籲儘速確立統治方針。²

日本統治台灣後，調查活動全面展開，台灣史成為日本史學研究的一環³，東京帝國大學與札幌農學校更是積極參與殖民地的各項工作。東大師生的調查研究開啓近代台灣學術研究之序幕，「台灣學」成為近代日本學術研究的領域之一，其成果為殖民統治當局施政的重要參考。⁴換言之，明治維新所創造的金字塔型菁英教育，不僅使東京帝大在日本國內握有領導權力，在殖民地也扮演極為突出的角色。⁵日治最初二十年間，札幌系關係者至少有一百三十九人來台發展，其校長佐藤昌介相當熱心引導畢業生來台，並非一般認知係由新渡戶稻造所促成；札幌系可說是台灣近代農學的開創者及近代化農業的推動者。⁶

¹ 吳文星，〈日本據台前對台灣之調查與研究〉，《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4），頁 567～576。

² 吳文星，〈民友社與台灣〉，《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1994.6），頁 561～578。

³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台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第 2 冊（台北：國史館，1998.12），頁 1999～2028。

⁴ （1）〈東京帝國大學與台灣「學術探檢」之展開〉，《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12），頁 11～28；（2）〈東京帝國大學の臺灣に於ける學術調査と臺灣總督府の植民地政策について〉，《東京大學史紀要》第 17 號（東京：東京大學，1999.3），頁 1～9。

⁵ 吳文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學術と植民地—開拓すべきもう一つの新たな研究分野—〉，《北東アジア研究》第 6 號（島根縣立大學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2004.1），頁 8。

⁶ 吳文星，〈札幌農學校と台灣近代農學の展開—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を中

上述的研究重視人物的角色與歷史文獻的解讀，其取徑啓發筆者甚多。此外，研究者對於總督府進行的大規模調查，例如舊慣調查⁷與宗教調查⁸及高等教育機關的南方研究⁹，也逐漸重新審視和詮釋。

調查與統治最初即結合在一起。¹⁰對急需琢磨殖民歷練的日本而言，擁有多數海外統治經驗的歐洲強國，不啻是借鏡的最佳對象。總督府對有關歐洲殖民主義各國的殖民地經營文獻之譯介，日俄戰爭以前已接近十種。¹¹派遣人員前往各地調查也是總督府經常採行的方法。石塚英藏被認為或許是第一人。石塚自 1899 年 9 月至 1900 年 12 月間，前往歐、美、亞三洲各個殖民地考察各種機關運用的實況，及殖民地與統治母國之間的關係等，藉以掌握各國殖民政策的梗概。¹²出外考察者往往負有特殊的任務在身，例如後藤新平與新渡戶稻造相偕於 1902 年 6 至 12 月前往美、歐進行殖民政策研究之旅，期間，9 月在柏林就人工樟腦問題加以交涉。¹³要之，正如長年在台從事醫學工作的堀內次雄於日治末期指出：歷代的總督、長官及各單位主管都能

心として一），《日本統治下台灣の支配と展開》（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04.3），頁 481~522。除了札幌農學校本身的推動，校友乃至官方似也扮演一定的角色。根據日本取台時擔任農商務大臣秘書官的早川鐵治回顧，農事試驗場和殖產局有許多人受到其關照。參見：早川鐵治，〈領台當時の人事と私の關係〉，《台灣大觀》（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2.12），頁 192~193。

⁷ 鄭政誠，《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台北：博陽文化，2005.6）。

⁸ 林佩欣，《日治前期台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⁹ 相關的論文例如：（1）許進發，〈台北帝國大學的南方研究（1937-1945 年）〉，《台灣風物》第 49 卷 3 期（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9.9），頁 19~59。（2）鄭麗玲，〈台北帝國大學與海南島—以海南島的學術調查為中心〉，《台灣風物》第 49 卷 4 期（1999.12），頁 19~59。

¹⁰ 1895 年 5 月，伊藤博文給首任總督樺山資紀的訓令中即提到：台灣荒蕪未開之地居其泰半，須講求將來大力開發之道，爰是特設殖產部以致力調查和勸誘。參見：伊藤博文（編），《台灣資料》（東京：原書房，1970.5），頁 438。

¹¹ 金子文夫，〈日本に於ける植民地研究の成立事情〉，《日本帝國主義と東アジア》（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79.3），頁 66。此外，在總督府擬定的舊慣調查事業實施計劃大綱中，亦揭櫫調查外國殖民地的實際情況，以究明其制度得失。參閱：春山明哲，〈台灣舊慣調查と立法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査と立案を中心に—〉，《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6 號（東京：綠蔭書房，1988.10），頁 91、95。

¹² 參見：《東台叢書》第 73 篇（台北：東台灣研究會，1930.9），頁 7。

¹³ 檜山幸夫，〈後藤新平・新渡戶稻造の歐美漫遊と公文書〉，《台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第七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10），頁 455~458。

理解、尊重科學並加以利用，也屢屢派遣新進的人才前往國外吸收新知，然後，再完全應用到各種事業上。¹⁴因此，透過考察總督府的派外政策，有助於吾人深入理解殖民統治者的施政方針。

日治初期，日本中央相當重視外界如何評論其治理台灣的能力。例如派駐上海的小田切萬壽之助代理總領事，1898 年底將有關報導經由外務省送達內閣；譯文的內容略謂：日本人進行的台灣統治，較預期來得困難，然而，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日本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吾人以爲日本應採擇古代羅馬、英國及荷蘭的拓殖策略，勿使台灣成爲無能力者與犯罪者的棄地，或別有私心以收斂爲能事的官吏之所在。¹⁵根據研究，日本最初幾年的作爲，使得西方列強消除原先高度的懷疑，轉而肯定各種調查的結果讓台灣的情況開始大白於世，並且遠比向來的中、西文資料更爲詳實和有價值。¹⁶無怪乎，樺山資紀的兒子樺山愛輔曾表示，由於貿易的關係不時前往美國等地，遇到機會便向外國人說日本的方法常帶有建設性，而且總會引用台灣的情形作爲例證。¹⁷要之，日本統治使台灣發生很大的轉變，台灣在某種程度上成爲日本的展示品(showpiece)。¹⁸

但眾所周知，日本在缺少經營殖民地經驗的情況下獲得台灣，面臨的困境之多不難想像，初期的混亂時而可見。被認爲奠定日本治台基礎的後藤新平日後曾如此回顧，台灣不妨說是在「幾無文明的殖民

¹⁴ 堀內次雄，〈醫事創設史〉，《始政五十年台灣草創史》（台北：台灣平定記念會編纂部，1944.12），頁 265。台灣平定記念會係日治初期軍政解除前來台者及其繼承者組成之團體，每年於「始政記念日」和台灣神社大祭前後聚會二次。參閱：村崎長昶，〈八十年の回顧録〉（東京：西田書店，1983.6），頁 92。

¹⁵ 明治三十一年《公文雜纂》第十二卷，〈台灣現時ノ形勢ニ關スル「上海マーキュリー」新聞所載ノ論說等在上海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送付ノ件〉。（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¹⁶ 吳文星，〈日據初期（1895-1910）西人的台灣觀〉，《台灣風物》第 40 卷 1 期（1990.3），頁 157~174。

¹⁷ 樺山愛輔，〈台灣に夢中だった父〉，《西郷都督と樺山總督》（台北：西郷都督樺山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1936.12），頁 79。

¹⁸ 1947 年，Durdin Peggy 在 Nation 雜誌撰寫“Taiwan: China's Unhappy Colony”，指出在一套有效率的官僚行政之下，台灣經濟呈現相當的發展，並領先同時代的中國。

政策之準備行爲」的情況下得到。¹⁹然而，十年之後，後藤新平在慶應義塾演說〈台灣經營〉，即認定日本統治台灣業已獲得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成功，後藤以爲「成功」的因素有三：國民的光榮、日本學術的進步及文明的力量。²⁰所謂「學術」、「文明」到底意味著什麼？無疑的，實與後藤的統治理念密切相關，即著名的「生物學原理」。²¹1929年4月，後藤病逝在京都府立醫院，《台灣日日新報》社論除了回顧其波瀾多折的一生之外，更點出九年的民政長官期間：特別是任用科學方面的人才，對台灣開發採用新學術的力量，……伯爵（指後藤）不愧是科學出身者，信賴科學的力量，並積極將其應用到產業和文化之上。²²

不過，時人如何看待學術與殖民地台灣的關係呢？在此擬以學者爲例稍作探討。首先，日本學者認爲台灣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例如1910年11月，京都帝大校長菊池大麓來台，目的是爲了考察阿里山的演習林。²³12月，菊池接受台灣教育會之邀針對「教育勅語」發表演說，特別以台灣爲學者的天堂破題，主張日本的學者應致力在台灣研究熱帶，經濟上將有許多可供其它地方研究參酌之處。²⁴返日之後，菊池亦表露同樣的看法，略謂：台灣於各種學術的研究，待出新機杼者，綽綽有餘裕也。²⁵關於台灣的學術價值，著名的中國研究者後藤朝太郎亦曾撰寫多篇文章，不時刊登《台灣日日新報》。²⁶

¹⁹ 《台灣日日新報》，1914.11.25，〈日本植民政策の史的經濟的關係（二）〉。

²⁰ 伊能嘉矩，〈領台十年史自序〉，《領台十年史》（台北：新高堂書店，1905.6），頁7。

²¹ 詳閱：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台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2.12）。

²² 《台灣日日新報》，1929.4.14，〈後藤新平伯つひに逝く〉。1931年3月4日《台灣日日新報》社論〈國策としての學術振興〉亦有如下的看法：後藤民政長官時代，特別注意科學的研究、獎勵及應用，今天台灣能有目前的進步，即是按此進行文化與產業方面的設施。

²³ 《台灣日日新報》，1910.11.22，〈菊池京大總長來著〉。

²⁴ 《台灣日日新報》，1910.12.12，〈教育勅語に就て〉。菊池的演講〈日本教育の大精神〉並刊登於12月底出版的《台灣教育會雜誌》第105號。

²⁵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11.1.13，〈渡台感想〉。

²⁶ 例如《台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1日〈帝都の學界へ台灣高砂族の文化

其次，時論經常呼籲當局重視學者的待遇。例如 1920 年，署名埋骨生撰文呼籲當局可利用學者來台的機會，向日本國內宣傳台灣。²⁷又如 1922 年，中央研究所技師山口謹爾奉命前往德國留學之際，報紙除了推崇其對台灣蛇毒素血清療法的貢獻之外，也特別指出日本相較於英、法、德三國，對學者的禮遇在制度上遜色不少。²⁸藉此督促當局檢討政策。再如著名記者今村義夫撰寫〈台灣研究從今而後〉，指出台灣研究在文史和理科的空間上非常寬廣，官民皆有義務給予學者各種方便。²⁹弔詭的是，學者接受總督府的栽培之後，爲了更上一層樓，轉而萌生希望離開台灣的念頭。³⁰因此，當局爲了留住人才，對於研究條件必須投注相當的心力。

日本人來台進行學術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旅行，有時牽涉到個人的家庭經驗。³¹然而，他們能在短期間之內親身體驗台灣，不可忽視人際網絡的資源。例如伊能嘉矩的學生板澤武雄於 1923 年夏天帶學生來台旅行，途中即受到不少人的協助。³²又如日本學術協會第十回大

を〉，以及 1925 年 8 月 8 日〈支那より見たる台灣の美觀〉等。以後一篇爲例，後藤朝太郎認爲台灣的研究機關，無論是經費、設備及人事皆可謂相當完整，並稱許舊慣調查會的巨冊調查書爲文化史上的大事業，而熱帶醫學則除台灣不作第二地想，恆春鵝鑾鼻的植育場更是日本唯一的熱帶植物研究機關。

²⁷ 《台灣日日新報》，1920.3.26，〈學者仲介プロバガンダ〉。

²⁸ 《台灣日日新報》，1922.1.12，〈學者を尊重する氣風〉。

²⁹ 今村義夫，〈台灣研究はこれから〉，《今村義夫遺稿集》（台南：今村義夫遺稿集刊行會，1926），頁 704～707。本篇雖然未註明寫作時間，但因文中提到桑田的民族心理學、田邊的原住民音樂，經過查閱可知今村閱讀東京社出版之《學藝》雜誌。該刊於 1922 年 12 月起連載田邊尙雄之〈台灣音樂考〉，1923 年初刊登桑田芳藏之〈台灣民族の文化觀察〉。

³⁰ 例如總督府醫院主任醫師兼醫學校教授尾見薰出國二年，1909 年回來之後即希望轉往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任職，惟其申請並未獲得同意。參見：第 1552 冊《大正八年高等官進退原議》，第 22 號〈賞與不相成件：尾見薰〉。

³¹ 例如考古學者濱田耕作曾來台三週，其心得刊登於 1938 年 2 月的《京都帝大新聞》。由此文可知，日治初期濱田的父親曾在台北、新竹、宜蘭等地任職警察三年之久，濱田每週須將家裡的近況以信件報告父親，而且弟弟當中的一人甚至取名爲「基隆」。參見：濱田耕作，〈青陵台灣遊記〉、〈台灣の旅—亡父の思出—〉，《青陵隨筆》（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7.11），頁 121～133。

³² 板澤武雄，〈台灣見聞記〉，《歷史地理》第 43 卷 4 號（東京：日本歷史地理學會，1924.4），頁 343～350。他們分別是博物館的森丑之助、圖書館的並河直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尾崎秀真，至於總督府醫專教授宮原敦則帶一行參觀圓山貝塚。

會於 1934 年 12 月下旬在台北帝大舉辦。³³該會自 1925 年創立以來，首次在「外地」召開大會，時論指出為台灣的文化發展畫下新紀元。³⁴英語學者市河三喜當時參觀博物館和人類學教室，在大會上吸收有關原住民的知識後，開始其環島之旅。³⁵仔細瀏覽文獻，類似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

個人或團體對研究經費的資助，也值得吾人加以注意。例如東鄉實於 1909 年被總督府派往德國留學，出發前偕同新渡戶稻造拜訪時任遞信大臣的後藤新平，後藤即表示如果將來錢不夠用，儘管開口別客氣，不過，東鄉後來倒是並未麻煩後藤。³⁶但由此可見後藤對於具有潛力者的眷顧之一斑。³⁷在團體方面，日本學術振興會與財團法人服部報公會，都曾補助研究經費給台北帝大的學者。³⁸當時，研究者出版書籍往往能獲得獎勵金，例如杵淵義房於 1940 年出版《台灣社會事業史》，即獲得有栖川宮記念學術獎勵資金的補助。³⁹

1930 年代，隨著日本踏上戰爭之路，學術與戰爭的關係變得格外密切。永井潛的例子清楚說明學者涉入戰爭的經過。三田定則與永井潛二人在東京帝大屆齡六十歲退休之後來台，後輩在其指導下從事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創設。⁴⁰1934 和 1935 年度為醫學部的準備時期，1936

³³ 彙報，〈台北帝大に開催される日本學術協會第十回大會〉，《南方土俗》（台北：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4.12）第 3 卷 2 號，頁 130~131。

³⁴ 《台灣日日新報》，1934.12.23，〈日本學術協會大會を迎へて〉。

³⁵ 市河三喜，〈台灣の旅〉，《昆蟲・言葉・國民性》（東京：研究社，1939.9），頁 10~13。市河寫道以前去過很多像希臘、埃及、朝鮮等往昔有過優越的文化，而今卻衰亡的地方，進入仍未開化的「蕃地」來見識原住民的生活還是頭一遭，為此行的最大收穫。

³⁶ 東鄉實，〈我植民地經營と後藤伯〉，《吾等の知れる後藤新平伯》（東京：東洋協會，1929），頁 117~125。

³⁷ 一個相當有名的例子是後藤對於正力松太郎經營《讀賣新聞》的幫助，直到後藤去世之後，正力才從其兒子一藏的口中得知後藤乃是以抵押住宅土地，設法籌措經費借給自己。參閱：北岡伸一，〈後藤新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4），頁 214~215

³⁸ 參見：《台灣時報》（1934.5），頁 82；《台灣日日新報》，1936.1.31。

³⁹ 牧野巽，〈台灣社會事業史〉，《社會學》第 8 輯（東京：岩波書店，1941.8），頁 432~435。

⁴⁰ 小田俊郎，〈再・永井潛先生の葉書〉，《小田俊郎先生追悼文集》（大阪：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部第一内科同窓會，1990.2），頁 176。

年初正式設立。⁴¹1937年，幣原坦告別台北帝大校長的生活。⁴²三田接著成為校長，永井擔任第二任醫學部長。小田俊郎回憶紀念演講會之前，永井曾告訴別人要遵守時間，但雄辯又熱情的永井卻說了近一個半鐘頭。⁴³該場演講為1938年5月第十一回開學紀念會，題目是「學術的使命」。永井認為學術研究必須有充分的自由；然而，隨著戰時氣氛的瀰漫，永井也必須藉由「奉獻犧牲」，巧妙串連日本精神和學術精神，提及學者有服務國家社會的責任。⁴⁴事實上，永井本人也身處時代的潮流之中。1939年6月，永井搭船前往北京大學⁴⁵，以正式就任北大醫學院院長。⁴⁶不久，獲准辭去台北帝大教授，且因在台一年十個月的成績受到肯定，獲得四百圓的獎賞。⁴⁷

由上可知，無論是總督府官員、來台考察的日本學者、一般社會輿論及身處學術殿堂的研究者，學術與殖民密切結合是顯而易見的事實。⁴⁸要之，正如東畑精一曾經指出，近代日本具有後進國家的性質，其作為獨立國家的最重要課題是國家的防衛，也勢必要以國防的手段

⁴¹ 三田定則，〈台北帝大の創立より工學部の設置まで〉，《台灣時報》第250號（1940.10），頁57。台北帝大歷任醫學部長依序為三田定則、永井潛、森於菟、富田雅次、小田俊郎、森於菟，相關介紹可參閱：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台北：該院，1997.6），頁110~111。

⁴² 松本巍（刪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60），頁30。1937年7月，伊澤多喜男寫信給幣原，對其致力經營台北帝大深深表示敬意，伊澤也提及創校的往事，覺得感慨良深。參見：大西比呂志（等編），《伊澤多喜男關係文書》（東京：芙蓉書房，2000.11），頁57。

⁴³ 小田俊郎，〈永井潛と私〉，《東寧會40年—台北帝大醫學部とその後—》（東京：東寧會，1978.3），頁123。

⁴⁴ 永井潛，〈學術の使命〉，《台北帝國大學紀念講演集》第7輯（台北：台北帝國大學，1941.1），頁1~14。

⁴⁵ 《台灣日日新報》，1939.6.28，〈永井博士北京へ出張す〉。當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透過興亞院華北聯絡部聘請永井，時間自6月28日至9月25日，並贈與旅費一千圓。參見：《公文雜纂・昭和十四年・第五十卷》，〈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永井潛中華民國臨時政府ノ囑託ニ應シ並旅費ヲ受クルノ件〉。（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⁴⁶ 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939.6.30。

⁴⁷ 第10098冊《昭和十四年六、七、八月高等官進退原議》，第102號〈依願免本官：永井潛〉。

⁴⁸ 1947年，Herbert Passin 撰寫“A note on Japanese research in Formosa”一文，刊登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雜誌。其指出學者在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從事研究，並累積可觀的成果。可見外界對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和學者扮演的角色，有相當正確的觀察。

開發殖民地，而爲了構築當地的基礎建設，社會治安和經濟秩序皆非仰賴根本的調查不可。⁴⁹

本文以「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究」爲題，對總督府的調查事業作較深入的探討。關於總督府調查課的研究，中村孝志論及大正南進期時，曾扼要描述調查課的工作重點和幾位靈魂人物，對後來的研究者提供良好的方向。⁵⁰至於個別的人物介紹，金子文夫整理東鄉實的生涯與著作，並且認爲其多樣的經歷典型體現近代日本殖民史。⁵¹此外，也整理井出季和太有關中國研究的作品，指出其以貿易統計的羅列、具體的制度解說爲主，屬於資料提供的性質。⁵²後藤乾一的傳記作品則細膩描繪原口竹次郎的生平點滴，認爲早稻田大學出身的原口儘管名義上只是囑託，但由於受到民政長官下村宏的賞識，實質上卻擁有統轄調查課的權限。⁵³

在組織與功能的研究方面，陳文添針對調查課於 1915 年底被暫緩設立與 1918 年 6 月恢復設置的經過，及其可能的原因加以研究。⁵⁴近藤正己則解析 1930 年代調查課進行資源調查的背景。⁵⁵陳俐甫強調官房調查課、台北高商及南洋協會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⁵⁶黑崎淳一進而討論調查課人員在台北高商教授外語，以及該校的畢業生任職調查

⁴⁹ 東畑精一，〈植民學の大觀〉，《東京帝國大學學術大觀 法學部、經濟學部》（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42.4），頁 639~655。1959 年，東畑自東大退休，擔任アジア經濟研究所所長。關於其學術成就，可參閱：原覺天，《アジア研究と學者たち一覽天交遊錄》（東京：勁草書房，1985.10），頁 79~92。

⁵⁰ 詳閱：中村孝志，〈大正南進期と台灣〉，《南方文化》第 8 輯（奈良：天理大學南方研究會，1981.11）。

⁵¹ 金子文夫，〈東鄉實の年譜と著作〉，《臺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1978.4），頁 127~128。

⁵² 金子文夫，〈井出季和太と日本の南進政策〉，《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3 號（1981.1），頁 69。

⁵³ 詳閱：後藤乾一，《原口竹次郎生涯：南方調査先驅》（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7）。

⁵⁴ 陳文添，〈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査課設立經過〉，《臺灣文獻》第 49 卷 2 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6），頁 135~145。

⁵⁵ 近藤正己，〈臺灣の勞務動員〉，《近代日本の歴史的位相—國家・民族・文化—》（東京：刀水書房，1999.11），頁 160~162。

⁵⁶ 陳俐甫，〈台灣與日本之學術「南進」〉，《台灣風物》第 47 卷 3 期（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7.9），頁 163。另可參閱：氏著，〈台灣與近代日本之東南亞研究〉，《台北文獻》第 123 期（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8.3），頁 35~36。

課的表現。⁵⁷此外，在南進的研究方面，鍾淑敏的眼光並不侷限於大正時代，一方面仔細重建總督府獲取海外情資的各種管道，檢討其性質與成效⁵⁸，進而針對個別的地域，探討「台灣經驗」的輸出⁵⁹，以及分析「南支南洋施設費」的運用實態。⁶⁰對於認識總督府在南進政策上的作為，較以往的研究更為細緻。

然而，時人如何看待總督府設立調查機關？該課的組織與功能是否隨時代不同而有改變？成立之後的人事佈局具有什麼特徵？為了進行各種調查，調查人員具備的能力為何？歷年的統計與調查業務受到外界多少的重視？該課所收集的資訊又透過何種機制向有關單位傳送？調查結果對於總督府的施政有何影響？在在都有待進一步加以深入討論。

本文以分析歷史文獻為主，並參考研究者的相關著作，作為討論之依據。在撰寫過程中，除了重建官房調查課活動的軌跡，也注意當時的評論，俾能適切理解該課的作為。在史料的運用上，主要利用《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人事資料⁶¹、總督府的各種出版品、當時主要的學術雜誌，及《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紙，藉以掌握動態消息。

⁵⁷ 黑崎淳一，《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與南支南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2002），頁 20~21、92~93、97~102。

⁵⁸ 鍾淑敏，〈台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7 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3），頁 695~733。

⁵⁹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台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台大歷史學報》第 31 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2003.6），頁 169~221。

⁶⁰ 鍾淑敏，〈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同上，2004.12），頁 149~192。

⁶¹ 研究者利用檔案中的人事資料並不始於今日。例如日治時期的產經作家宮川次郎認為名氣不若新渡戶稻造響亮的山田熙是台灣糖業發展的構想者，為尋找山田在台的事蹟，於是從總督府查出山田的履歷。參見：宮川次郎，《糖業禮讚》（台北：台灣糖業研究會，1928.6），頁 155~158。